

新农村建设中农户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偏好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农田水利设施为例

孔祥智 涂圣伟

内容提要 本文遵循 CV 法一般原理,以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为例,通过入户调查数据对影响农户需求偏好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公共物品需求偏好受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村庄特征共同影响,但不同特征变量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存在显著性差异。

关键词 公共物品 需求偏好 CV 法

农村税费是农村公共产品的总体补偿价格(吴朝阳、万方,2004)。目前,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主要是通过农民自愿或非自愿地自筹资金来实现的(孙立刚,2000)。虽然中央和省一级财政对县乡财政进行了转移支付,但有限的转移支付大多被基层财政支出刚性消耗掉,大多数基层财政仅仅能够维持自身的运转,根本谈不上能提供满足农村生产生活所需的公共物品。同时,“一事一议”作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另一种政策安排,虽然可以为区域性农村公共物品提供资金,但实践表明,“一事一议”政策的可操作性并不强,作用的范围也很有限。在这种背景下,加大政府间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农村公共财政支出已经成为政府部门和理论界的共识(熊巍,2002;朱柏铭等,2002;高新军,2003;李秉龙等,2003;财政部农业司《公共财政覆盖农村问题研究》课题组,2004)。在政府财力仍然有限的情况下,对农民需求偏好的了解是政府有效提供公共物品的前提。

一、文献综述

估计家庭公共物品需求一直以来都是公共财政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焦点(Daniel L. Rubinfeld, Perry Shapiro and Judith Roberts, 1987)。近年来,通过或有估价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简称 CV 法)揭露偏好的方法在国外已得到广泛应用。CV 法的核心思想是通过调查和问卷形式揭示出居民对公共物品的真实支付意愿,这种意愿代表了偏好或需求,因此可以用来估计居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函数,从而为公共物品决策或效率评估提供依据。Ciriacy - Wantrup 最早提出了这种方法,但他并没有将其付诸实践。在实践应用方面,Bergstrom, Rubinfeld 和 Shapiro (1982)作了开创性研究。他们基于微观调查数据,利用单方程技术对地方公共教育支出的需求函数进行估计,纳入估计的因素主要有税收价格、居民收入、年龄、种族、性别、就业状态、是否乐观者、拥有小孩的个数等。随后,在 Bergstrom 等人的研究基础上,Rubinfeld, Shapiro 和 Roberts (1987)舍弃了单方程技术,利用改进的似然估计法对地方公共教育需求进行了估计,其研究也重点考察了税收价格、家庭收入对家庭需求的影响,但增加了一些政治变量,并试图排除蒂布特偏差(Tiebout bias);Asa Ahlin 和 Eva Johansson(2001)采用类似 Bergstrom 等人的方法,利用瑞典数据分析了瑞典居民对地方公共教育的需求,他们将就业类型、性别、年龄、政治偏好、税收价格、拥有小孩个数等作为需求影响变量进行了显著性估计。总体而言,国外通过运用不同计量方法对公共物品需求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已经比较成熟,其主要争议体现在一些变量的选择和数据的处理上。但迄今为止,国外有关农村公共物品需

* 本研究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项目“公共财政支持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研究”的初步研究成果

求的定量研究仍比较少见。在国内,大部分有关农村公共物品的研究都是从供给角度展开的,对公共物品需求的研究文献很少见,有关公共物品需求因素识别的文献则更少,而且大多数研究只是停留在定性描述上(寿学军,2002;夏杰长,2003;姚从容,2005,等),缺乏微观数据基础上的定量分析,对农村公共物品需求的定量研究还基本处于空白。本文以农业税取消作为研究的基本环境假定,在此基础上,借助实践调查资料,对影响农户农村公共物品(本文以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为例)需求的各因素进行识别,以期构建农村公共物品需求偏好表露机制提供依据。

二、理论框架

假定农户是预期效用最大化的行动者。 A_i 为社区 i (本文以村为单位) 当期在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存量; q_{ij} 为社区 i 中第 j 个农户对社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需求量(本文用支出量代替实物单位), q_{ij} 为随机变量,有:

$$E_i = \alpha_0 + \alpha_1' x_j + \epsilon_j \quad (1)$$

其中, E_i 为 q_{ij} 的对数形式; x_j 为个人和环境特征向量; α_0 为截距参数, α_k 为各变量的系数; ϵ_j 为独立同分布随机变量,服从均值为 0、标准差为 σ 的逻辑斯谛分布。由于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的整体消费特点,每一个消费者消费的都是一个完整的公共产品(许彬,2003)。因此,通过比较农户对社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需求 q_{ij} 和实际的支出存量 A_i ,我们可以假定:当 $q_{ij} > A_i$,即社区内现有支出存量不能满足农户的需求时,农户 j 会认为需要增加该种公共物品的支出;当 $q_{ij} \leq A_i$,即农户认为社区内现有支出存量已能满足其需求时,农户 j 会认为不需要增加该种公共物品的支出*。为此,我们用 y_j 表示农户 j 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真实需求意愿,并假定 $y_j = 0$ 表示农户认为不需要增加该种公共物品的支出; $y_j = 1$ 表示农户认为需要增加该种公共物品支出。依据上述分析,我们建立实证模型如下:

$$\ln\left(\frac{P_j}{1 - P_j}\right) = \alpha_0 + \sum_{k=1}^n \alpha_k X_{jk} \quad (2)$$

由式(2)可得:

$$P_j = P(y_j = 1/X_{j1}, X_{j2}, \dots, X_{jn}) = \frac{\exp(\alpha_0 + \sum_{k=1}^n \alpha_k X_{jk})}{1 + \exp(\alpha_0 + \sum_{k=1}^n \alpha_k X_{jk})} = E(y_j) \quad (3)$$

根据相关研究和对需求影响因素的一般性认识,本文认为受访者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以及所在村村庄特征都会对农户农田水利设施支出需求意愿产生影响,并对这些因素在回归函数中的系数符号做出假设(见表 1)。

三、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 2005 年 8 月份笔者对江苏淮安的实地调查。调查依据典型抽样原则选择了淮阴区和盱眙县 2 个样本县,每个县选取 4 个乡镇,然后依据随机抽样原则在这 8 个乡镇共选择了 12 个村,在 12 个村中随机调查了 117 个农户,其中有效样本数为 113 个。

(一) 受访者个人社会人口统计变量描述

国外相关研究表明,受访者社会人口统计变量(是否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经历等)会对农户需求偏好产生显著的影响。本文试图将农户个人特征变量纳入分析,并对受访者个人情况进行了调查,其中,受访者是户主的占 88.5%,年龄主要集中在 50~59 岁,受教育程度初中文化程度的为 38.9%,当前仍然务农

* 农田水利设施具有很强的区域性,村庄内部不同区域的水利设施条件可能存在一定差异,而农民对现有支出状况的判断很可能是基于其耕地所处区位的水利设施状况作出的

表1 自变量系数符号假设

变量代号	变量简称	部分封闭型答案 (以0为基组)	系数符号
受访者个人特征变量			
X ₁	年龄	+	
X ₂	受教育年数	+	
X ₃	有无特殊经历	0 无; 1 有	+
X ₄	当前是否务农	0 否; 1 是	+
X ₅	当前是否还从事其他职业	0 否; 1 是	-
农户家庭特征变量			
X ₆	家庭劳动力人数		+
X ₇	家庭劳动力中非农就业比率		-
X ₈	可灌溉面积		+
X ₉	水稻播种面积		+
X ₁₀	家庭灌溉交费		-
X ₁₁	2004年家庭总收入		+
X ₁₂	农业物资投入		+
村庄特征变量			
X ₁₃	村亩均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投入存量		-
X ₁₄	户均水田面积		+

的占到94.7%。

在有效样本中,受教育年数在0年(不包括0)、6~9年(不包括6)、9~12年(不包括9)各组间的,认为需要增加支出的农户所占比例分别为55.56%、61.36%和68.97%。依据描述性分析可见,农户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希望增加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支出的意愿就越强。再结合农户的经历看,曾经有特殊经历的农户希望增加支出的需求意愿更强烈。在113个受访者中,有特殊经历的占53.1%;有特殊经历的60个受访者中,认为需要增加支出的占到75%。

(二) 农户家庭特征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从家庭劳动力*人数看,受访者所在家庭人数主要集中在2~4人,这部分受访者家庭所占的比重达到83.2%。问卷表明,农户家庭劳动力人数越多,需要增加支出的意愿越强。家庭人数为2~4人的样本户中,认为需要增加支出的农户占各样本组农户数的比例分别为68.29%、70.37%和73.08%。在113个有效样本中,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比率小于25%的占到47.8%,非农就业比率低于50%的样本占到70.8%。问卷表明,增加支出的意愿随着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比率的提高而逐步降低。

我们依据经验重点考察了耕地中可灌溉面积的大小对农户需求意愿的影响,将农户拥有的可灌溉耕地面积划分成0~3亩、3~6亩(不包括3亩)、6~9亩(不包括6亩)以及9亩以上4个等级,认为需要增加公共支出的人数占相应样本数的比例依次为62.86%、69.23%、84.21%和85.71%。可见,农户拥有的可灌溉耕地面积越大,其希望增加农田水利建设支出的意愿就越强烈。此外,农户水稻播种面积大小与农户需求意愿也呈正相关关系,水稻播种面积为0~3亩和3~6亩(不包括3亩)的农户中认为需要增加支出的农户所占比例分别为64.44%和73.33%。

为了进一步分析家庭收入对农户需求意愿可能存在的影响,我们将样本农户按收入进行了分组,划分为10000元以下、10000~20000元、20000~30000元以及30000元以上4个等级。结合农户的需求意愿看,需要增加支出的人数在各组间总体上是递增的,但收入与需求意愿的变化方向并不总是一致的(见表2)。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农户的兼业行为。在下面所做的计量分析中,我们按照经验对收入变量取了对数,以消除异常观测的敏感度。

表2 各收入组农户需求意愿分布状况 (人、%)

农户	需要增加(1)	不需要增加(2)	(1)/[(1)+(2)]
10000元以下	39	17	69.64
10000~20000元	24	13	64.86
20000~30000元	11	4	73.33
30000元以上	4	1	80.00

相比收入的波动性而言,农户生产支出在年际间更加平稳。在考察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影响后,我们进一步考察了农业物资投入对农户需求意愿的影响。本

文的物资投入只计算了2005年农户家庭用于水稻种植的化肥、农药支出。同收入一样,我们按投入量大小对调查户进行了分组,分组以支出的平均值588.66元为界分为两组。从分组的结果来看,投入量在平

* 本文研究的劳动力为年龄在18~60岁间的健康人口

均值以下的农户占 67.3%,这部分农户中有 68.42%认为需要增加支出;平均值及以上的农户占 32.7%,这部分农户中有 72.97%认为需要增加支出。因此可以初步判断,农户农业生产相关投入量越大,农户希望增加农田水利设施支出的意愿就越强。同收入变量一样,我们在下面的计量分析中对农业物资投入变量也取了对数。

价格是影响物品需求的最基本的因素。对公共物品而言,由于不存在公共品市场,因此对其价格的考量是十分困难的。为了避免遗漏变量偏误,本文用农户家庭年缴纳的灌溉费作为价格的代理变量进行了分析。从调查数据的统计结果看,农户年平均缴纳的灌溉费为 123.39 元,最高交费达到 800 元。为了考察农户灌溉支出对需求意愿的影响,本文按灌溉支出低于 100 元、100~200 元、200 元以上的分类标准将农户划分为 3 个组,认为需要增加支出的农户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66.13%、65.63%和 78.95%。

(三) 村庄特征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在当前商品经济条件下,农户的生产经营活动并不是封闭进行的。农户生产行为与外部环境的关联性决定农户的需求意愿必然受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本文将农户置入村庄这个大环境,试图考察村亩均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投入存量和户均水田面积大小等村庄特征对农户需求意愿的影响。

一般而言,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投入存量较大的村,农户需要增加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支出的意愿要更弱。由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投入的长效性,我们扩展了调查的时间区间,考察了被调查村自 1995 年以来有关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累积投入量。调查显示,被调查村在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普遍较少,且差异极大,并且没有发现亩均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投入积累量大的村的村民需要增加支出的意愿更弱的证据。在下面的计量分析中,我们以各村自 1995 年来是否投资进行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作为村亩均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投入存量的工具变量进行分析,以考察村级投资行为对农户需求意愿可能产生的影响。此外,我们还考察了户均水田面积对农户需求意愿的影响。

四、计量分析

由于利用 LPM 拟合出来的概率可能小于 0 或大于 1,而且任何一个以水平值形式出现的偏效应都是不变的(Wooldridge, 2003),所以我们选择了二值响应模型 Logit 模型。采用逐步回归法,我们分别建立 3 种 Logit 模型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模型 1 是将所有变量引入方程所得到的估计结果,模型 3 是剔除所有不显著变量后再次回归的结果。模型 2 是回归过程中的一个步骤,列出这个模型只是为了方便比较。表 3 显示了各模型中变量的估计系数、卡方统计量以及 Cox & Snell R^2 和 Nagelkerke R^2 统计量(见表 3)。依据模型显著性检验标准,模型 1 在总体上是不显著的,模型 3 通过了总体方差检验,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意义,所以我们主要解释模型 3。但是,模型 3 的拟合优度显得比较低,其原因主要有:一是缺失值导致在研究中删除了一些重要变量,造成模型解释力下降;二是意愿调查中常见的“策略性偏误”导致变量调查数据不够准确,从而影响了估计的精度。

通过对逐步回归过程的考察可以发现,模型估计的结果和我们的假设基本是一致的。从模型 3 的估计结果看,在 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的变量有:受访者受教育年数,家庭可灌溉面积、家庭灌溉交费、户均水田面积。其中,家庭可灌溉面积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模型结果显示:

1. 需求意愿在不同受教育程度受访者间存在显著差异。相比年龄导致的需求差异而言,因受教育程度不同而导致的需求差异在农户间更为明显。受访者受教育年限是显著变量,回归系数为正值,这说明农民受教育年数越多,其认为需要增加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支出的意愿就越强烈。

2. 家庭可灌溉面积对农户的需求意愿有显著影响。模型中该变量的估计系数为正值。这意味着拥有可灌溉面积越大的农户,其更倾向于认为需要增加支出。这是因为,农户自身的感受是决定其需求意愿的基础。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村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投入不足,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配套不全。在这种情况下,拥有较大需灌溉面积的农户对这种不足现状更为敏感。某种投入量虽然可以满足灌溉面积小

的农户的需求,但可能并不一定满足拥有较大需灌溉面积农户的需求。如果存在这种差异,农户的需求意愿存在差别就是显然的了。

3. 家庭灌溉交费多少与农户的需求意愿是反向的。模型中该变量回归系数为负值。这说明,农户家庭年灌溉交费越多,其需要增加支出的意愿就更弱。这类似于一般商品价格的作用机理。作为社区性公共物品,如果没有外部投入或外部投入很少的情况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增量更有可能以水费的形式分担,导致农户需交纳的水费增加,从而降低农户认为应增加支出的意愿。但是,由于农户的灌溉需求具有刚性,即一定的灌溉面积与一定的灌溉需求对应,如果现有的水利设施建设支出没有满足农户的需要,农户对水费变动的敏感度就会下降。模型中该变量的系数为 - 0.005,表明农户对水费并不是十分敏感,这正好说明我国目前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支出是普遍不足的。

4. 户均水田面积对农户需求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户均水田面积较大的村,村中认为需要增加支出的农户所占比例更高。这是由于对户均水田面积较大的村而言,农田水利设施投入不足所造成的后果显然要更严重。这些村民对这种不足现状的感知就更强烈,因此需要增加支出的意愿就更迫切;

表3 Logit 模型估计结果

Independent Variable	Mdel 1	Mdel 2	Mdel 3
	Coefficient (Std. error)	Coefficient (Std. error)	Coefficient (Std. error)
X ₁	0.005 (0.026)	—	—
X ₂	0.104 (0.064)	0.100 * (0.059)	0.093 * (0.054)
X ₃	0.462 (0.481)	0.463 (0.473)	—
X ₄	0.187 (1.029)	—	—
X ₅	- 0.639 (0.564)	- 0.678 (0.524)	—
X ₆	0.192 (0.225)	0.210 (0.216)	—
X ₇	- 0.889 (0.955)	- 0.878 (0.865)	—
X ₈	0.256 ** (0.120)	0.247 ** (0.115)	0.245 ** (0.111)
X ₉	0.021 (0.151)	—	—
X ₁₀	- 0.006 (0.004)	- 0.005 ** (0.002)	- 0.004 * (0.002)
ln X ₁₁	0.134 (0.337)	—	—
ln X ₁₂	0.130 (0.141)	0.125 (0.123)	—
X ₁₃	- 0.223 (0.524)	—	—
X ₁₄	0.197 (0.173)	0.177 (0.166)	0.294 * (0.152)
constant	- 3.725 (3.675)	- 2.159 ** (0.975)	- 1.377 * (0.751)
- 2 ln (likelihood)	117.617	118.064	123.242
Cox & Snell R ²	0.154	0.151	0.111
Nagelkerke R ²	0.219	0.215	0.158
Mdel (Sig.)	0.170	0.030	0.010

同时,农民的从众心理增强了这种结果。根据“阿希实验”原理,由于农户间交流的频繁性,个体农户容易受到群体影响而改变自己的观点和判断,以和他人保持一致。因此,如果村里认为需要增加支出的农户较多,其他村民最终认为需要增加支出的可能性就越大。也就是说,部分村民表露的意愿不是基于其个人的需求,而是周围人的意愿。

5. 其他影响因素。从模型2变量系数看,对农户需求意愿存在较大影响的因素还有农户的经历、职业状态和家庭劳动力中非农就业比率。有过特殊经历的农户认为需要增加支出的意愿更强。这可以解释为,曾经有过特殊经历而目前在务农的农民,他们在知识和信息的拥有量上要超过没有过特殊经历的农民,因此更能形成对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重要性的整体认识,这种认识并不仅仅是基于个人需求的判断。

五、结语

本文以农田水利设施为例对农户农村公共物品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需求意愿受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以

及村庄特征的共同影响,但各变量的影响程度具有显著差异。总体而言,村庄特征对农户需求意愿的影响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最需要什么样的公共服务

——农民对农村公共物品投资的意愿分析

李 强 罗仁福 刘承芳 张林秀

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 2003 年和 2005 年两次抽样调查数据对村级公共物品投资状况进行研究,特别是采用小组访谈方法对农民对农村公共服务项目的满意程度、对村投资和自己出资进行公共服务建设的投资意向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农民对道路、灌溉的满意度最低,但农民其投资意愿却是很高的;而对垃圾站的投资的满意程度和投资的意愿都很低。因此,针对目前农民对公共物品投资的意向,政府部门应当加强对农民不满意但又有强烈投资需求的项目的投入;同时对农民既不满意也不愿投资但和新农村建设相关的项目也应给予支持。

关键词 农村公共物品 投资意愿 小组访谈

一、背景

以前的研究(e. g. , Huang , Zhang , and Rozelle , 1998 ; Park and Wang , 1999) 证明 , 尽管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 但国家扶贫项目并不是贫困减少的主要动力。2004 世界发展报告也指出 , 贫困人口很难获得有效的公共服务 , 例如道路、教育、健康服务、卫生的饮用水、通讯等 , 而这些服务对于农村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已有的研究表明 , 近几年来中国农村公共物品投资活动十分活跃 , 而且中国政府一直努力进行扶贫和扶助生态脆弱区发展 , 而且公共物品投资更多的是资助西部不发达地区 (张林秀等 , 2005) 。同时中国基层民主管理程度越高 , 也越有利于村级资源的合理利用 , 并且在资源的分配上更有利于向公共服务项目倾斜 (zhang , et al. 2004 ; 张林秀等 , 2005a ; 罗仁福等 , 2006) 。 Calderon and Serven (2004)

要大于家庭特征的影响 , 而家庭特征的影响又大于个人特征对农户需求意愿的影响。出现这种结果主要是因为 , 我国目前农村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投入普遍不足 , 但地区之间存在差异 , 因此 , 政府是否进行投入以及投入量的大小就成为影响农户决策的最主要因素。本文旨在进行理论上的分析 , 文章的主要意义在于为建立新的农户需求表达机制提供一种思路。因素选择是估计农户需求的基础。通过选择合适的因素 , 我们可以利用调查数据较准确计算出农户对某种公共物品的需求。

参 考 文 献

1. Asa Ahlin , Eva Johansson , Individual Demand for Local Public Schooling : Evidence from Swedish Survey Data ,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 8 (2001) : 331 ~ 351
2. Daniel L. Rubinfeld , Perry Shapiro , and Judith Roberts , Tiebout , Bias And The Demand For Local Public Schooling ,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 Vol. 69 , No. 3 , (Aug. , 1987)

*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编号:70225003/70024001)、世界银行和福特基金会对项目的资金支持

的研究表明,增加落后地区公共物品的提供数量和提高公共物品的提供质量对于减少收入分配差距有显著作用。

虽然公共物品投资对减少贫困、发展农村经济有重要作用,但也有些国内和国际机构资助的政府项目并没有起到作用,有些促进经济增长的项目实际上造成了经济增长速度的降低。例如,资助那些实际上对经济没什么影响的企业,同时还占用了其他投资资金(Rozelle, Park, Benziger, Huang, 2002)。

尽管中国目前投资的总体趋势是朝好的方向发展(张林秀等, 2005a),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耕地少,部分地区仍相当贫困,还需要加大这种投入的力度。实际上,与东亚国家在快速增长时期相比,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农村投入的人均水平还是相对较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望解决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社会各界所关注的农村农业长期投入严重不足的问题。但是,加大科技、资金投入数量和规模只是农村取得新的进步的前提,如何保证财政资金的足额到位和使用效率,如何保证公共财政的投资效果,如何保证技术的适宜性,这些问题在2000年农村税费改革后乡村可用财力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愈显重要。

二、数据来源

本文分析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分别于2003年和2005年收集的关于中国农村生产和发展投资的两套数据。我们的研究团队,包括国内外合作者在内,共同设计了抽样程序并且最终确定了以村为单位的调查方式。对于第一套数据的收集,我们的调研队伍,包括来自于中国和北美教育机构的30名研究生和研究人員,最后在全国有代表性地抽取了6个省的36个县进行调查,每一个样本省、县和乡都是随机的选取*。有关这次调查的详细介绍,请读者参阅张林秀等(2005a, 2005b)以及罗仁福等(2006)。

第二套数据是于2005年进行的追踪调查数据。这套数据以2003年大样本调查中的所有村作为本次抽样的样本总体。所有列出的村中,在5个省中随机抽取100个作为样本(每个省5个县,每个县2个乡镇),每个乡(镇)2个村)。样本的选取是分层次的(按人均收入),把一个省分为5组(最富有的20%的县为1组,第二富有的20%的县又为1组,依此类推),确保每组抽取1个县。

在这100个村中,每一个村除了规范问卷调查外,我们设计了新的数据收集方法:小组访谈。每个小组由随机抽取的6个农民组成。他们没有一个人现在或以前当过干部或者是干部的亲戚。调查员把这6个被访者集中起来讨论,讨论的内容包括对村里基础设施建设的看法等许多问题。在讨论过程中,另外一个调查员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记录(并且进行编码整理):是否满意本村公共物品的服务水平?如果村里获得5万元资金,赞成投资于哪一类型项目?是否愿意为基础设施投资贡献力量(包括劳动和资本投入)?除了定量的信息之外,我们还记录了村民在讨论有关村子的环境和基础设施投资过程中一些定性的反应。

3. Rexford E. Santerre, 'Spatial Differences in the Demands for Local Public Goods', *Land Economics*, 61 (2) :119 ~ 128
4. S. Grosskopf and K. Hayes, 'The Demand for Local Public Goods: Choosing an Appropriate Functional Form', *Applied Economics*, Vol. 18 (November 1986) :1179 ~ 1192
5. Theodore C. Bergstrom, Daniel L. Rubinfeld, and Perry Shapiro, 'Micro-based Estimates Of Demand Functions For Local School Expenditures', *Econometrica*, Vol. 50, No. 5 (Sept., 1982)
6. 吴朝阳, 万方. 农村税费改革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转变.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04(5) :6 ~ 9
7. 孙立刚.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经济学分析.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学刊*, 2000(2) :24 ~ 26
8. 张林秀, 李强, 罗仁福, 刘承芳, 罗斯高. 中国农村公共物品投资情况及区域分布. *中国农村经济*, 2005(11) :18 ~ 25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北京 100872) 责任编辑 吕新业

* 调查样本村来自于6个省,江苏省代表东部沿海发达区域(江苏、浙江、山东、上海、福建和广东);四川省代表西南地区的省份(四川、贵州、云南和广西);陕西省代表黄土高原地区(山西、陕西以及内蒙古);甘肃省代表西北地区(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河北省代表北部和中部分省份(河北、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和江西);吉林省代表东北地区(辽宁、吉林和黑龙江)。虽然本研究的分类和标准的农业生态区不完全一致,但是调查结果表明这一分类也有其合理性,基本上起到代表全国的作用。在广东的预调查表明,由于广东省的方言很难懂,如果到这一地区调查,很难有效的和被调查者进行沟通。同时一个研究资助单位要求本研究在西北至少要选两个省,而且本研究的预算没法支持再增加1个省(如湖南或湖北)作为样本省

MAIN CONTENTS

Ways to Build the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in China

..... *HAN Changfu* (4)

Building the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China today. The author gives emphasis on eight aspects, among others. It is always necessary to put at the first plac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ity in rural areas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o the end. The government must make great efforts to improve all kinds of social undertakings in rural regions, and speed up the public infrastructure there

The "Hot" and the "Cold" in the Building of the New Countryside in China Today *LI Shengzhu* (7)

Demand Preference and Constraints to Provide Public Goods Required in Our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A Case of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Facilities *KONG Xiangzhi and TU Shengwei* (10)

Applying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and taking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facilities as example, the authors analyze the farm households' demand preference in terms of public goods on a basis of house-to-house questionnaires. It is found that their preference is affected by personal character, household types, and village, all taken together. It is interesting that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directions and degrees caused by difference in the factors mentioned above

What do Villagers Really Want? Understanding Villagers' Willingness to Invest in Rural Public Services *LI Qiang, LUO Renfu, LIU Chengfang and ZHANG Linxiu* (15)

In light of building New Socialistic Countryside, there is a recent policy emphasize on investing more in rural public services. Nevertheless, there has been little understanding of what public services villagers really want. This essay uses data from 100 villages in rural China to address how villagers are satisfied with their public services and what villagers are willing to invest in these public services? Descriptive analysis shows that although villagers are least satisfied with roads and irrigation facilities in their villages, roads and irrigation facilities are the top two public services that villagers are willing to invest in. By contrast, villagers are neither satisfied with garbage disposal service nor willing to invest in it

Supplies of Infrastructure as Public Goods in Rural China: The Government, Communities and Market *YU Ji* (21)

The infrastructure in rural area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public, quasi-public, and club-like. Hence, it i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e necessity to adopt a multi-supplying fashion, where the government, community and market can do their best. While the government should play the main role by using the public finance, it is wise to encourage the farmers to participate in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facilities, and let the market to engage in profitable undertakings